

# 清代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

朴基水

(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

**摘要:**自明中叶以来,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佛山镇作为手工业城市开始兴盛起来。由于水路交通便利,佛山作为国内各省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头角日益峥嵘,甚至凌驾于广东省会——广州之上的商业城市。本稿从各个侧面对清代佛山手工业者、商人的组织行会和会馆进行了考察,指出:引导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组织行会和会馆大量出现,呈现了若干共同的特征:第一,几乎看不到在其他地方常见的称为“公所”的组织名称;第二,佛山的行会组织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的,会馆则主要是在各种行会得到充分成长、发展的清代后期(道光~光绪年间)建立的;第三,随着清末的社会变化,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出现了兴亡盛衰的反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铁制品、其它金属制品和棉制品等等的流入,许多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衰落了,但也有部分行业的行会,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西方产品展开竞争,某些行会随着出口扩大,到清末反而获得了发展。在工业和商业发达的佛山,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也是佛山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

**关键词:**佛山镇; 城市发展; 手工业行会; 手工业会馆; 商业行会; 商业会馆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 序论

笔者曾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角度,对明末清初以来被称为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一的佛山镇的城市发展进行过考察,<sup>1</sup>描绘了导致佛山镇发展的铁器制造业的实际状况和商业发展面貌。但尚未对实现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商人、手工业者及其组织——行会和会馆进行深层分析。本稿拟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考察其组织状况和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盛衰情况。

关于清代佛山镇,史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几乎没有专门论述佛山的行会和会馆等方面情况的成果。中国学者蒋祖缘论述了佛山的商业和商人,概括地言及了行会和会馆;<sup>2</sup>罗一星也在其最近的著作中专门设立一节,论述了会馆和行会。<sup>3</sup>但笔者分析的具体内容与以上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部分,主要表现在罗一星的研究虽然比较仔细,但是停留在静态分析上,没有从动态的角度讨论行会随着清末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发生的变化。

本文将就行会和会馆组织化对佛山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行会在清末急剧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面貌等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佛山城市发展的外貌表现——人口集中和人口增加的问题,然后论述人口增加所必然导致的城市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外观方面的变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考察与外观变化相应的一种内部变化——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出现,以及行会组织——会馆和堂等等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侧面,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产品的流入等导致的行会盛衰,及佛山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变化。

## 第一章 清代佛山的城市发展

### 1. 佛山的人口增加

清代乾隆(1736-1795)以后,中国人口激增,结果农村出现了人口过剩。农村的过剩人口

<sup>1</sup>朴基水:《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之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韩国)第69辑,2000。

<sup>2</sup>蒋祖缘:《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sup>3</sup>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章第3节——《经济组织的双重分化与发展》。

移居到人口比较稀疏、土地较为充足的地方，比如仍可能进行垦殖的山岳地区，从事农业、林业等，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为了解决生计，来到了工作机会多的城市，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以上现象在清代广东省比较典型。

广东省的失业破产农民流往的主要城市是省会广州和铁器制造业发达的佛山镇。佛山镇自明末清初以来即作为“天下四大镇”和“天下四大聚”之一而声名远扬，失业破产的农民为了解决生计、商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纷纷涌入。乾隆 19 年(1754)编纂的佛山乡志里记载“四方商贾”和“四方之贫民”涌入佛山，“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sup>1</sup>。由此可以看出：移居佛山的人民大部分是谋求生计的贫民，即失业破产农民。他们在佛山主要从事何种职业？

据民国 18 年《四会县志》载：“乾嘉以前，俗尚敦朴，富者守田业，贫者勤职事，物价不昂，家易给足，民无越境以谋生者。士之籍授徒以糊口者，亦上至广宁而止。嘉庆末年，乃有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佛山、省城者，已固讳言之，亲友亦私相谓曰：‘某近果切干耶，何使其子弟出外，学生意也’。盖俗谓贫曰‘切干’，谋生曰‘做生意’也。道光之初，俗渐奢华，富者日贫，贫者益不给，遂相率往佛山、省城以图生计。”<sup>2</sup>

从上述资料可以总结出几个事实：第一，嘉庆(1796-1820)——道光年间(1821-1850)，由于过剩人口增加，乡村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人们不得不离乡谋生，开始是家中的一个年青人到城市挣钱，帮助维持生计，最后则不得不全家都到城市去工作；第二，涌向城市的人们主要前往去佛山或广州，在那里学习手工业技术或在商店里工作，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第三，史料对人口流往的主要城市虽然是佛山和广州并称，但从佛山被放在前面来看，向佛山移居的人数可能比广州更多。

农村破产失业的农民来到佛山等城市，一般成为手工业店铺的实习工人、商店的店员或搬运行李的脚夫。此外商人、知识阶层、退職官员也为了商业、学业和养老而移居佛山。<sup>3</sup>此种移住人口的数字非常难以正确地计算，但从朱相朋的议论来看，康熙末年已相当不少，其称：“禅山，东南一巨镇也。其西北一带，上溯浚水，可抵神京，通陕洛以及荆吴诸省。四方之来游者日以万计，然皆以舟舶泊岸，不少劳余力也。”<sup>4</sup>经过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之后，数字可能又有所增加了。随着四面八方的众多人口涌进佛山，移住人口(附图占籍者)是土著居民数的几倍。<sup>5</sup>佛山的人口本来就相当繁众，再有许多人口涌进来，单从人口来说，它与北京、苏州、汉口一起被称为“天下四大聚”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佛山镇到底有多少人口？

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约一万余家；<sup>6</sup>清乾隆年间(1754 年左右)佛山户口数增加到 3 万余家，<sup>7</sup>增加了 2 倍；民国时期佛山的户口数是 53,504 户，人口是 31 万 4816 名，<sup>1</sup>户均人

<sup>1</sup>乾隆 19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6《乡俗志》，第 8 页 a。

<sup>2</sup>民国 18 年《四会县志》编一《輿地志·风俗》，第 58 页 ab(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 108 页)。

<sup>3</sup>吴荣光：《重修佛山海口文昌阁记》，道光 6 年(1826)立石，文载道光 11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2《金石下》，第 37 页 b-第 38 页 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 收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 258 页。

<sup>4</sup>朱相朋：《建茶亭记》，康熙 61 年，见于道光 11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2《金石上》第 49 页 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第 237 页收录。

<sup>5</sup>冼宝楨：《重修佛山堡八图祖祠碑记》，见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 257 页。以下略称为《佛山资料》。

<sup>6</sup>陈贽：《祖庙灵应祠碑记》，景泰 2 年(1451)作，收入道光 11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2《金石上》第 13 页 a，第 219 页。关于明代佛山人口的质疑，参照拙稿：《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第 69 辑，2000，第 157 页。

<sup>7</sup>乾隆 19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3《乡事志·墟市》，第 28 页 b“论曰：吾乡谬以饶富闻，而无蓄积之实，鳞次而居者三万余家。”另外，黄兴礼：《新建忠义乡亭记》(乾隆 9 年，道光 11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2《金石下》第 5 页 a，第 242 页)中记载：“佛山，岭南巨镇也……地灵人杰，烟火万家，衣冠相继。”与其说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佛山的人口状况，不如说是一种惯用表达方式，乾隆《佛山忠义乡志》中记载人口数是“举镇数十万人”，所以笔者认为 3 万余家符合实情。

口是 5.9 人。中国自古到今户均人口数是 5 人，笔者认为佛山户均人口数是 5.9 人，可能是将商店和手工业店铺里雇用的店员等人口包括在内的数值。佛山的代表性手工业地区之一的明照铺，有店铺和房屋 549 户，男女老少 4,834 口，每户人口数是 8.8 人；另一代表性商业地区——汾水铺，有店铺和房屋 4,794 户，男女老少 42,876 口，每户人口数是 8.9 人。<sup>2</sup>笔者认为：以上事例正说明佛山户均人口超过 5 口以上，是由于在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商店或手工业店铺存在着几名雇用店员或劳力，其数字很可能被包括在人口统计之中。如果明代清乾隆时期也是一样的人口结构的话，那么佛山的人口在明景泰年间(15 世纪中叶)大约是 6 万，清乾隆年间(18 世纪中叶)大约增加到 18 万。虽然无法知道道光年间的确切人口数，但如果按照清·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的人口增加速度和比率计算的话，则几乎达到 26 万名。<sup>3</sup>最近中国学者罗一星推定鸦片战争之前佛山的人口大约是 27 万，<sup>4</sup>与笔者的推算接近。

## 2. 城市结构和市景的变化

移住居民的人口增加，导致了佛山居住地区的扩大和店铺数量的增加。例如三穴岗在明代是墓地，但清乾隆年间“已平为列肆”<sup>5</sup>，乾隆 60 年(1795)举人李天达等出资，在汾水正埠码头闸内两边的空地上建了 10 间店铺，租借给商人。<sup>6</sup>水田和桑地也被开发，被利用为百姓的住宅或作业场、埠头等设施，从其他地方来的商人移居到佛山，建设住宅或庄园的事也非常多。<sup>7</sup>像上面在佛山不断建起店铺和住宅，到清末店铺和住宅密集，已经没有了新的住宅用地或建筑用地<sup>8</sup>。随着人口的流入，出现了租赁房屋，提高利益的风潮。清初南海人陈子升(1614-1673 以后)向南海县知县寄的书信就体现了该点。陈子升在信中说佛山因为和广州相邻，所以“近年流寓丛杂，商贾充塞，土著射利，并室而居，以取赁值，客胜于主，里巷骈闳，比于城市”。<sup>9</sup>

随着上述的人口增加、居住地区的扩大和店铺数的增加等，佛山城市空间构造的变化和其他设施的增加状况如何？可据以了解佛山的街道的数字、规模和其他城市设施增加情况的文献，是《佛山忠义乡志》。该志成书于乾隆年间以后，乾隆乡志是乾隆 19 年(1754)编纂的，道光乡志编纂于道光 11 年(1831)，民国乡志则是民国 15 年(1926)编纂的。通过佛山乡志可以概括佛山镇的变化状况。表 1 和表 2 是以乾隆 19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和卷 3《乡事志》，道光 11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和卷 5《乡俗》，民国 15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舆地志》和卷 8《祠祀志》的资料为基础，将清代佛山城市地区和城市设施发展状况作成图表的。

佛山城市区划的基本单位是铺。铺是明景泰初(景泰元年即 1450)为了防备骚扰广东一带的海贼黄萧养(1449 年蜂起)的侵掠而形成的一种防卫建置，当时把佛山街市分为 24 个铺

<sup>1</sup>民国 15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舆地·铺》，第 15 页 b-第 31 页 a(见于《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 319-327 页。)所载 28 铺的户口数是 52,376 户，30 万 7060 口，其中包括了鹰嘴沙的 1128 户、7756 口。

<sup>2</sup>民国 15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舆地·铺》，第 16 页 b，第 28 页 b(第 320 页、第 326 页)。

<sup>3</sup>黄建新、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历史学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 43 页中推算为大约 30 万，但笔者觉得有点过分。首先，他们把民国 15 年的佛山人口计算为 34 万，户数为 5.2 万户，户口数计算中只包括 28 铺，人口数计算则把 28 铺和四沙都包括进去了。当时佛山由 28 铺和鹰嘴沙构成，四沙中有 3 沙不属于佛山。因此他们计算得出的户均人口数为 6.5 名。正如笔者已经指出那样，民国时期每户人口数应该是 5.9 名。参照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舆地·铺》，第 12 页 b-第 13 页 a(第 318 页)。

<sup>4</sup>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 277-79 页。

<sup>5</sup>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

<sup>6</sup>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 13《乡禁·广储义仓碑示》，第 24 页 a b(第 276 页)。

<sup>7</sup>此事例见罗一星，参照前书，第 256-58 页。

<sup>8</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9《氏族·祠堂》，第 31 页 a《方伯家庙记》(第 448 页)中记载为“佛山居人稠密，未易得地”。

<sup>9</sup>道光 15 年《南海县志》卷之八《舆地略四·风俗》第 8 页 a。

来守护。原来是“铺”，因有列肆之意，后被讹传成了舖（按：二字原本不同，但简化汉字已合二为一。）<sup>1</sup>也就是说，佛山街市原是根据防御需要来区划的，击退黄萧养的侵掠以后，铺自然地作为街市区划而存在、延续了。乾隆年间，铺的数字增加到 25 个，道光年间是 27 个，民国时期是 28 个。从铺的数字来看，佛山街市的扩大是非常缓慢的。

比起铺的缓慢增加，街道的增加非常明显。乾隆年间，有街、巷、里、口、路、坊等 234 个，道光年间增加到 594 个，民国时期为 1590 个，各增加了 1.5 倍、5.8 倍。这可能是因为街市的商店、手工业店铺和一般房屋增加的结果。街道增加可能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四方商贾”和“四方之贫民”涌进佛山的结果。特别是由“挟资以贾者”新盖店铺，雇佣劳动者和店员，因此街道数增加了。另一方面，原来在佛山经营的商人也积蓄资本，增加店铺或者在其他街道开设分行，同样可能促进了街道数量的增加。根据光绪 2 年(1876)的资料判断，金钱大街上有 13 个在其他街道设本行店铺的分行，聚义会即有 9 个。<sup>2</sup>根据记载 19 世纪 80 年代的情况的《佛山清涌碑记》判断，福宁里有 3 个在其他街道上设本行店铺的分店，明照铺有 2 个。<sup>3</sup>

表 1：清、民国时期佛山城市区域和设施的发展概况

项目	乾隆 19 年		道光 11 年		民国 15 年		
	个数	指数	个数	指数	个数	指数	道光=100
铺	25	100	27	108	28	112	103.7
街道	234	100	594	253.8	1590	679.5	267.7
墟	4	100	4	100	6	150	150
市	9	100	9	100	12	133.3	133.3
津渡码头	11	100	28	254.5	62	563.6	221.4
桥梁	9	100	19	211.1	23	255.6	121.1
寺庙	55	100	117	212.7	195	354.5	166.7
里社	13	100	68	523.1	79	607.7	116.2
宗祠	146	100	177	121.2	376	257.5	212.4

墟市原来是 3 墟 6 市<sup>4</sup>，乾隆年间增加到 4 墟 9 市。至道光年间为止，没再增加，但此后增加了二个墟，三个市。道光年间的人口被推定为 26 万，每个墟市平均利用人口数为 2 万名。民国时期，人口为 31 万 4,816 名，每个墟市平均利用人口数约 17,500 名。作为商业发达，日常生活品依赖市场的城市，墟市数字太少了。加藤繁的研究把广东一个定期市的平均利用人口数估算为 8,149 名，<sup>5</sup> 与之相比，佛山的墟市数是太少了。可能因为佛山镇本身即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对定期进行商品交易的定期市的需要非常少，佛山数量众多的街道，几乎每天进行商品交易，所以可能不需要特别有定墟期进行交易的定期市。只是和一般街道交易的商品种类不同，存在着只在墟市里交易的商品，但由于资料上的限制，无法知道商品的种类。

<sup>1</sup>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铺社》，第 5 页 b。

<sup>2</sup>《光绪二年岁次丙子重修佛镇柵下天后元君古庙官绅值事善信芳名喜认各物签题工金各行工料杂项费用开支数目刊列碑记》（《佛山资料》，第 172 页，第 177 页），以下此碑记略称为《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

<sup>3</sup>《佛山资料》，第 216-17 页。

<sup>4</sup>民国 15 年《佛山忠义乡志》卷 1《輿地·墟市》，第 33 页 b(第 328 页)。

<sup>5</sup>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23-2, 1936；《支那经济史考证》(下)，东洋文库，1952，第 505～556 页。加藤繁概略探讨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 7 省的状况，在各省定期市的人口数当中，广东省是 8,149 名，山东省是 7,895 名，两省定期市的人口数属于最少的一类，因此两省的定期市比起其他省多。

与乾隆年间相比,‘津渡马头’在道光、民国时期各增加了 1.5 倍、4.6 倍。这是因为佛山的商品交易发展和人口流动增加而出现的现象,可以说明佛山具有了作为商业城市的面貌。桥梁的增加亦是人口流动性加大的结果。此外,从寺庙、里社和宗祠的增加,可以看出佛山民间信仰的扩散、信仰体系的组织化、地缘团结的巩固化和宗族的扩散与凝结等现象。

另一方面,表 1 中把以乾隆年间为基准的指数和以道光年间为基准的指数(表 1 中“道光=100”是把道光年间算作 100 的意思)进行比较,可以了解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的发展程度,以及道光年间到民国时期的发展程度。从比率上看,铺、津渡码头、桥梁、寺庙、里社等在道光以前呈现高速发展,街道、墟市、宗祠在道光以后呈现高速发展。总体来说,道光以前时期的城市发展更加迅速。但以上纯粹是根据比率来计算的,如果看各项目绝对数字的实际增加,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乾隆到道光年间各项的增加数字,和道光至民国时期各项的增加的数字,如表 2 所示:

**表 2: 清、民国时期佛山城市区域和设施的发展概况**

项目	乾隆	道光 11 年		民国 15 年	
	个数	个数	增加数	个数	道光—民国增加数
铺	25	27	2	28	1
街道	234	594	360	1590	996
墟	4	4	0	6	2
市	9	9	0	12	3
津渡码头	11	28	17	62	34
桥梁	9	19	10	23	4
寺庙	55	117	62	195	78
里社	13	68	55	79	11
宗祠	146	177	31	376	199

由表 2 可见,道光以后,除铺、桥梁、里社以外,街道、墟市、津渡码头、寺庙、宗祠等的数字比以前更加急速增长。可以说佛山镇自鸦片战争以后,城市发展更加迅速。

佛山镇北边有汾江流过,东、西、南三面有佛山涌婉曲流过,被江和水路包围。从整体形状来看,东西呈长方形。根据罗一星的研究,清代前期,佛山的城市空间构造在机能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东南和南部为铁器铸造、冶铁业等手工业地区,汾江沿岸的北部地区形成利用水路交通的商业地区,二者之间的中部则形成了住宅、商业和手工业交杂的混合地区。<sup>1</sup>

实际上,属于佛山南部锦澜铺的、与铁器制造业有关的街道名称在乾隆《佛山忠义乡志》中有两个(铸钻街,铸犁嘴)<sup>2</sup>;道光年间也有两个(铸砧街,铸犁大街)<sup>3</sup>;民国乡志中增加到 6 个,即铁廊巷、铁香炉街、铸钻街、铸钻上街、铸犁大街、铸犁横街<sup>4</sup>。表明锦澜铺的铁器制造业发达。还有和锦澜铺相邻的明照铺,也有 8 个炒铁的店铺(炉),桥亭铺水便有 4 个。<sup>5</sup>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佛山的南部地区,铁器制造业盛行。

佛山北部的汾水、富文、大基等 3 铺濒临汾水(汾江),道光年间设置了 19 个埠头(码头),占当时佛山镇 28 个埠头的 68%。此三个铺位于水路交通要地,具有便于人员、物资交流的条件,因此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商业地区。这一点可以从 3 个铺的街道数量上得到证实。道

<sup>1</sup>罗一星,参照上书,第 260-274 页。

<sup>2</sup>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收录于《佛山资料》,第 275 页)。

<sup>3</sup>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第 28 页a(第 28 页)。

<sup>4</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舆地志》,第 18 页b(第 321 页)。

<sup>5</sup>《佛山清涌碑记》,《佛山资料》,第 217-8 页,第 237 页。

光年间，佛山有 27 个铺、594 条街道，平均每个铺的街道数为 22 条，汾水铺却有 47 条街道，富文铺有 45 条，大基铺有 26 条<sup>1</sup>，均远超过平均数。在佛山街道总数中，3 个铺的街道数占大约 20%。这一情况在民国时期依旧如此。民国时期，佛山有 28 铺、1590 条街道，平均每铺约有 57 条街道，此 3 铺的街道数则分别为 84 条、129 条和 99 条，总计 312 条，还是大约占佛山街道总数的 20%。如果从人口数量来看，民国时期，其比重更加增高，3 铺的人口数量合计为 111,992 口，占佛山人口总数 314,816 名的 35.6%。<sup>2</sup>由此可知，濒临汾江的 3 铺地区是佛山最繁华的街市区。这种状况通过人们对清末佛山汾水铺商业繁盛的言论也可证实。时人称：“佛岗(山)之汾水旧榔榔街，为最繁盛之区，商贾丛集，闾闾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广州]不及也。惟街衢较窄，有仅容二人并行者”。<sup>3</sup>

与佛山南部和东南部发展成为手工业地区、北部作为商业繁盛地区的情况相比，中部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是一个复合的或者混合的地区。该区的鹤园铺鹤园社、祖庙铺花衫街、丰宁莺岗等处，有土针行的手工业作业场，<sup>4</sup> 潘涌铺是有绸缎行零翦店<sup>5</sup>的商业地区，同时该地区是佛山有名的宗族群体居住地。<sup>6</sup>

但以上情况不过是一个倾向性。由于在传统社会里行政当局没有通过彻底的城市计划进行规范城市建设，佛山的城市空间构造并不像罗一星主张的那样清楚地分为三个部分。

## 第二章 佛山的手工业行会、会馆及其盛衰

### 1. 手工业行会

佛山是自明中叶以后以铁器制造业繁荣起来的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原来就发达。<sup>7</sup>手工业除了铁器以外，还有各种金属铸造业、绢织物业、衣料业、衣服业等，通过表 3<sup>8</sup>所列清代佛山据手工业行业分类的行会可以充分了解情况。

全部 90 个行会，以铁器制造业行会最多(32 个)，此外有金属铸造业(9)、绢织物业(2)、衣料业和衣服业(6)、纽扣(4)、鞋袜帽制造业(8)、染色染料业(3)、制纸业(5)等。这些手工业部门，大体上可以分为铁器等与金属有关的手工业，和绢织物业等与衣料有关的手工业，其中最显著的是铁器制造业。这里我们有必要概括一下铁器制造业行会的发展状况。

明中叶以后，广东各地生产的生铁几乎都运到佛山加工，结果佛山成为广东、甚至全中国的铁器制造业中心，铁器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由于铁器制造业不断分化，技术更加高度发展。明朝天启 2 年(1622)，就已经存在的炒铁业和铸铁业，分化发展成为七行，<sup>9</sup>即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锁行、铁线行、农具杂品行、钉行。其中锅行在乾隆年间又分化为大镬头庄行、大镬车下行、大锅搭炭行等；炒铁行分化为炒炼钳手行、炒炼头庄行、炒炼二庄行、炒炼催铁行。此外，又有锯行、打拔铁线通行等新行出现或更换名称出现。<sup>10</sup>光绪年间

<sup>1</sup>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 1《乡域志》，第 14 页 a-第 21 页 b(第 21-24 页)。

<sup>2</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街道》，第 15 页 b-第 31 页 a(第 319-327 页)。

<sup>3</sup>徐珂：《清稗类钞》第 5 册《农商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 2333 页。

<sup>4</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工业》，第 15 页 b(第 387 页)。

<sup>5</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b(第 392 页)。

<sup>6</sup>参上揭罗一星书，第 268-270 页。

<sup>7</sup>关于这一点，参拙稿：《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之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第 69 辑，2000。

<sup>8</sup>该表系利用《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清涌碑记》(《佛山资料》，第 100-101 页，第 156-201 页，第 210-248 页)；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 2，《初与邱滋畚书》，第 10 页 a；《佛山街里》，道光 10 年，怡文堂 [谭棣华：《广东历史问题论文集》(台北：稻花出版社，1993)，第 226-233 页，从《佛山街里》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工业》第 9 页 b-第 20 页 b，第 384-390 页等制成。

<sup>9</sup>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3《乡事志：纪略》，第 4 页 b-第 5 页 a。

<sup>10</sup>《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佛山资料》，第 100-101 页)。

(1875-1908)还有单烧车下行、双烧担行、单烧助行、大锅助行、大锅车下行、<sup>1</sup>铁锅刚济堂、宰烧行、新钉行<sup>2</sup>等；光绪 12 年(1886)以后到民国时代，存在有铸砧行、机器铁杯行、车磨铁器行、铁砖行、铁钉行、打刀行、打剪锻行、土针行、铸发行、拆铁行、白铁行等。<sup>3</sup>

以上铁器制造业种类的多样化、分工的细化,以及行会的发展,无可置疑地证明佛山的城市发展得益于铁器制造业的发展。

**表 3：清代佛山按手工行业分类的行会**

手工行业	手工业行会的名称
铁器制造业	炒铁行、熟铁行、铁镬行、土针行、铸发行、铁砖行、铁钉行、打拔铁线通行、大镬头庄行、大镬车下行、炒炼钳手行、炒炼头庄行、炒炼二庄行、炒炼催铁行、锯行、熔（火且）行、单烧车下行、双烧担行、单烧助行、大锅助行、大锅车下行、宰烧行、铁锅刚济堂、铸砧行、机器铁杯行、车磨铁器行、打刀行、打剪锻行、拆铁行、白铁行、大锅搭炭行、新钉行。
金属铸造业	金箔行、银器行、打铜行、铜线行、铜箔行、铜器行、一字铜行、锡行、锡箔行。
绢织物业	帽绫行、机房土布行。
衣料业、衣服业	新衣行、成衣行、顾绣行、头绳行、绒线行、毡料行。
纽扣制造	丽袞金银钮行、凿花钮行、花钮行、钮扣行。
靴、袜子、帽子制造业	唐鞋行、革履行、布袜行、绵袜行、秋帽行、冬帽祖会、冬帽行、制帽行。
染色、染料业	染房行、花红行、自制颜料行。
制纸业	花红染纸行、杂色染纸行、揽磨纸行、楮公堂、朱砂年红染纸行。
制药业	蜡丸行、药材行。
酿造业	制造酒行、蒸酒行。
包装原料	板箱行、板箱（木界）斗行、扎作行。
与信仰、文化有关	门神行、书籍行、印刷行、香行。
扇子制造	葵扇行、苏扇行。
嗜好品、娱乐用品	玩具行、炮行。
装饰品制造	花盆行、金花行。
建筑木材业	泥水行、大料行。
其他	石行永庆堂、宰猪行。

表 3 中提及的各行成立于什么时期,难以一一考证,但从《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和乾隆年间的人物龙廷槐的《敬学轩文集》卷 2《初与邱滋畚书》两个史料中出现的 45 个行来看,<sup>4</sup> 至少成立于清代乾隆以前。当然,其中有些可能自明代以来就存在,也

<sup>1</sup> 《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资料》，第 156-201 页。

<sup>2</sup> 《佛山清涌碑记》光绪 12 年，《佛山资料》，第 210-248 页。

<sup>3</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工业》，第 387-393 页。

<sup>4</sup> 《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佛山资料》，第 100-101 页中出现了以下行名：“打包祖案众信、糙米铺、履行、黄白纸行、筛择行、油行、打拔铁线通行、大镬头庄行、大镬车下行、炒炼钳手行、炒炼头庄行、炒炼二庄行、炒炼催铁行、锯行、大锅搭炭行、包头行、锡行、银器行、绵袜行、鲜鱼行、神香行。”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 2《初与邱滋畚书》第 10 页 a 中有以下记载：“其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其行店为当商、放赈铺、换银铺、洋货铺、珠宝铺、参茸行、布行、木行、生铁行、铁器行、绸缎棉花行、青麻行、铜行、锡行、西货行、海味行、京果行、油行、豆行、谷埠、米行、槟榔行、烟叶行、

有可能清乾隆年间才出现的。

此处的行指制造相同种类产品的手工业主、手工业劳动者的组织。其中的一部分行,例如花盘行<sup>1</sup>、杂铁行<sup>2</sup>等行中存在行规,从此可以看出是含有Guild性质的行会。自嘉庆、道光以来,工商业组织由从前的行会或会馆等名称,改称为公所是普遍的,特别是清末在上海设立了114个公所,在苏州设立了66个公所。手工业部门中称为公组织的组织,清朝后期以后大多都出现了。<sup>3</sup>但是佛山的情况不同,几乎不用公所为名,<sup>4</sup>仍被称为行或会馆、堂等,可以说仍然使用行会或会馆等名称是佛山地区工商业的一个特征。

## 2. 手工业会馆

行会组织扩大,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为了组织成员间的和睦、团结,就具备了出现会馆或堂等独立的建物或空间的条件。下面试着整理佛山的手工业行会中保留会馆或堂的情况。

如表4<sup>5</sup>中所见,33个手工业行会保有会馆或堂。此处的会馆意味着手工业行会组织的集会场所,或者其建筑物;堂可能发挥和会馆相似的作用。考察一下保留会馆或堂的行会种类,即可看出佛山不愧是铁器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和铁制品有关的9个行保有着会馆或堂(炒铁行、铸发行、杂铁行、铁锅行、熟铁行、铁线行、铁镬行、打锁行、土针行)。其次是和金属有关的4个行(金箔行、铜铁行、赤线行、一字铜行),和绢织物有关的两个行(帽绫行、机房土布行),帽子制造业的两个行(冬帽行、制帽行),制衣业的两个行(成衣行、新衣行),和建筑有关的两个行(泥水行、大料行)都保有着会馆和堂。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确认佛山铁器制造业所占比重和铁器手工业主的团体化和组织化等现象。

表4中出现的另一个特殊现象是行会中业主(东家)的行和劳动者(西家、西友)的行区分开来,各自组成的事实。广东地区一般称此为东家行、西家行。广州的绢织业行会—机行也分为东家行、西家行。东家行是手工业店铺主人的组织,西家行是劳动者的组织。<sup>6</sup>广州打石业者建立的石行也分为东家行和西家行;<sup>7</sup>佛山与铁器制造有关的杂铁行(东家:日升堂,西家:锐成堂),铁线行(东家:同庆堂,西家:同志堂),铁镬行(东家:未详,西家:陶全堂会馆)中也组成了东家行、西家行的组织,此外绢织物业的行会帽绫行和机房土布行,与建筑有关的泥水行和大料行,与鞋有关的唐鞋行,与制纸业有关的朱砂年红染纸行,与纽扣制造有关的钮扣行等共10个行会,都形成了东家行和西家行的组织。虽然会馆或堂是否存在无法确知,但可以肯定花盆行在乾隆6年(1741)已有分为东家和西家的组织。<sup>8</sup>

从兴纶西友行、酱料西友荣德堂<sup>9</sup>等组织名称在史料中出现的情况,可以看出该业种劳动者的

---

金丝行、磁器行、果干行、药材行、柴行、炭行、糖行”。

<sup>1</sup>《陶艺花盘行规》,光绪25年(1899),《佛山资料》,第254页。

<sup>2</sup>《各货工价单》里有记载,使人推定存在行规。罗一星,同上书,第351-2页。

<sup>3</sup>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90-302页。

<sup>4</sup>除了南洋染料行的堂名被称为裕安公所(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商业》,第25页a第392页)、黑白铅行的组织被称为铅务公所(罗一星,前揭书第339页)以外,找不到别的事例。但是笔者认为以上情况与其说是清代的情况,不如说是民国时期的情况。

<sup>5</sup>该表系利用《鼎建佛山炒铁行会馆碑记》乾隆15年;《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助工金碑记》;《鼎建帽绫行庙碑》;《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清涌碑记》;《重修轩辕会馆碑记》,光绪24年(《佛山资料》,第75-76页,第100-101页,第139-140页,第140页,第156-201页,第210-248页,第253-54页。);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初与邱滋畚书》,第10页a;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会馆》,第36页b-第37页a,第71页;《佛山街里》,道光10年,怡文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工业》,第9页b-第20页b,第384-390页等作成。

<sup>6</sup>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广州工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情况调查记录:第三次访问丝织工人》,第184-5页。

<sup>7</sup>《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州工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情况调查记录:第三次访问打石工人》,第188-9页。

<sup>8</sup>《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佛山资料》,第47-60页。

<sup>9</sup>《佛山清涌碑记》,《佛山资料》,第211-212页。

组织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表 4：清代保留会馆、堂的佛山手工业行会

行会名	会馆、堂名	会馆设立年	店铺、人数	其他
金箔行	金箔宝光堂	雍正 2 年	30 余家	大者曰行, 小者曰馆
唐鞋行	福履堂(东家)、	乾隆 8 年	约百数十家	各店多在潘涌大街
	儒履堂(西家)	乾隆 8 年		
炒铁行	炒铁行会馆	乾隆 15 年	炒炉 40 余所	
铸发行	既济堂	乾隆 44 年		兼商业行会
杂铁行	日升堂(东家)	嘉庆 6 年		
	锐成堂(西家)	嘉庆 6 年		
帽绫行	兴仁堂会馆(东家)	道光 9 年	192 店	博望侯庙(信仰对象)
	兴仁堂会馆(西家)	道光 9 年	1109 人	
铁锅行	刚济堂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冬帽行	冬帽行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熟铁行	熟铁行会馆	道光 10 年		
	楮公堂会馆	道光 10 年		
蒸酒行	蒸酒行会馆	道光 11 年	家数三四十	甌数七八十
铁线行	同庆堂(东家)	道光 15 年	十余家	佛山特产。店:城门头, 圣堂乡等处。
	同志堂(西家)	同治元年	工人千余	
铁镬行			土炉三十家	本乡特有工业, 官准专利。各店多在栅下铺。
	陶全堂会馆(西家)	道光 17 年		额题太尉庙
铜铁行	利金堂	同治元年		
赤线行	联胜堂	同治元年		
打锁行	万兴堂	同治元年		
香行	香行会馆	同治 2 年		
朱砂年红染纸行	同志堂	光绪 2 年以前	大店数十家	又称染馆者数十
	至宝祖社	同上	数百	
宰猪行	紫全堂	光绪 10 年以前	五十余家, 工人五六百	
绒线行	** 会馆	光绪 8 年	大小二十余家	店铺多在畸(田令)街、三角市
板箱行	同善堂	光绪 10 年以前		
土针行	□□堂	光绪 12 年	约二三十	本乡特产。店多在鹤园社、花衫街、莺岗等处
机房土布行	东友会馆(兴仁堂)	光绪 15 年重修	八九十余家	博望侯古庙
	西友会馆(兴仁堂)		工人二千余	博望侯庙
成衣行	轩辕会馆	光绪 24 年以前	店铺 75 个, 工人 425 名	每个店铺劳动者数: 5.7 名
新衣行	福胜会馆	光绪 33 年		商业行会存在
泥水行	荣盛会馆(东家)	光绪 33 年重修	百五十余家	额题北城侯庙
	桂泽堂(西家)		工人 1300 余	

制帽行	制帽行会馆		二十余家	本乡业此者颇多
自制颜料行	五云会馆			
一字铜行	□□会馆		二十余家	
钮扣行	东家行会馆		二十余家	本乡著名工艺
	□□会馆			
金花行	广怡会馆		家数三四十 女工数百人	本乡特产， 女工居家制作。
苏扇行	苏扇行会馆			
大料行	建筑东家广善堂			各店多在上沙沙口大 基尾等处
	大料西家敬业堂			

如上行会中的劳动者组织即西家行出现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建立这类组织，是想确保劳动者之间的亲睦和协调利益关系的发展。如表 4 所见，帽绫行的劳动者人数为 1,109 人，铁线行有千余名，机房土布行有 2 千余名，泥水行有 1,300 余名，拥有千名以上劳动者的行会有好几个。虽然没有包含在表 4 中，但打铜行拥有大小数十家店铺、2 千余名劳动者；<sup>1</sup>铁钉行在道光、咸丰(1851-1861)时期达到最盛，工人达到数千名，<sup>2</sup>书籍行全盛时期的工人也不少于千名。<sup>3</sup>根据文献记载可以推测：佛山的代表手工业——铁器制造业行会中包含着许多劳动者。如清初人屈大均(1630-1696)即称：“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sup>4</sup>即使把数十看成 20，每个店铺仍至少有 200 名劳动者；清乾隆 15 年(1750)属于炒铁行会馆的炒铁业店铺有 40 余个，<sup>5</sup>因此乾隆年间至少亦有 8 千名炒铁劳动者。据说乾隆年间(1736-1795)有 100 余个铸铁的店铺，<sup>6</sup>作为铸造铁器过程的铸铁，一般要比炒铁的规模大，铸铁劳动者最少要 2 万名以上。

如上所述，由于每个职业种类的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以此为基础的劳动者的独立组织相应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手工业主之间可能出现矛盾和对立。如果比照清初苏州缙织业、踹布业等雇工较多的行业中所发生的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纠纷，<sup>7</sup>人们很可能误以为在佛山也存在着同样的对立和纠纷，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清代佛山，还没发现劳动者因赁金与雇主发生纷争的记录，<sup>8</sup>反而发现了手工业行会的东家和西家之间互相协助和调整的事例，有为修建会馆而共同集资的事例，也发现了互相商议、制定行会制造产品工价的事例。例如道光 9 年(1829)建立帽绫行会馆时，除了 192 名东家集资以外，还有 1109 名西友捐资助成其事。<sup>9</sup>光绪 24 年(1898)成衣行重修轩辕会馆时，有 75 名店主和 425 名以上的劳动者共同捐资，东家每个店铺出银 2 元，西友则捐献赁金的十分之一。<sup>10</sup>生产花盆、金鱼缸和建筑

<sup>1</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工业》，第 14 页 b，第 387 页。

<sup>2</sup> 同上书，卷 6《实业·工业》，第 15 页 b，第 387 页。

<sup>3</sup> 同上书，卷 6《实业·工业》第 19 页 a，第 389 页。

<sup>4</sup> 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下，卷 15《货语·铁》，第 410 页。

<sup>5</sup> 《鼎建佛山炒铁行会馆碑记》，乾隆 15 年(《佛山资料》，第 76 页)。

<sup>6</sup>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6《乡俗志·气候》(《佛山资料》第 297 页)。

<sup>7</sup> 分析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中收录的碑刻资料，可以确认共有 28 件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纠纷，其中 15 件起因于赁金问题。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314-315 页。

<sup>8</sup> 《申报》光绪 7 年 8 月 30 日(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702 页。)中记载铜器行内的工人之间发生纷争的报道，但这不是工人和店铺主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店铺的工人与另一店铺工人之间的纠纷。

<sup>9</sup> 《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助工金碑记》，《佛山资料》，第 139-140 页。

<sup>10</sup> 《重修轩辕会馆碑记》，光绪 24 年(《佛山资料》，第 253-54 页)。

零件的花盆行(或称花盘行),乾隆6年(1741)由东家和西家‘面议’,规定了337种产品的工价。<sup>1</sup>甲寅年(1794,1854?)东家和西家商议,重新制定行规;<sup>2</sup>此后,光绪25年(1899),东家和西家又互相商议,进行了重新规定。<sup>3</sup>与苏州由于矛盾和对立引起纠纷不一样,东家和西家互相商议、共同决定事情的惯例是佛山特有的现象。

下面讨论会馆或堂的设立时期。根据现存史料,雍正2年(1724)设立了金箔宝光堂,这是最早的金箔行会馆。此后,唐鞋行在乾隆8年(1743)、炒铁行在乾隆15年(1750)、铸发行在乾隆44年(1779)、杂铁行在嘉庆6年(1802),先后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其余大部分行业的会馆和堂是在道光年间以后建立的,根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刊行于民国15年(1926)的事、以及记录方式为“制帽行:从前本乡业此者颇多”<sup>4</sup>等情况,我推断:设立年代大约在光绪年间(1875-1908)。因为文中“从前”的意思很可能是光绪年间。由此可以看出,与行会组织相比,会馆或堂的设立时期较晚。总之,佛山手工业行会的显著发展,与其说是在清代前中期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不如说是在清代后期的道光~光绪的年间。

### 3. 手工业行会的盛衰

下面笔者将考察一下随着清末社会经济的变化,佛山手工业行会所经历的变化。首先,行会衰败现象频频出现于史料记载中,最突出的现象是不少行会由于西方商品的进入而衰退。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增加,其结果是西方的棉纱、棉布、铁制品及其它金属制品大量涌入中国,铁制品和其它金属制品的进入,给相应的行会或业种以非常大的打击。以下略引一些议论加以证明:

铁砖行:“用生铁炼成熟铁,作为砖形,售诸铸铁器者,亦乡之特产品。谚称:‘(虫雷)冈银佛山铁’,言其多也。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业此者矣。”

铁线行:亦佛山特产“……前有十余家,多在城门头圣堂乡等处。道咸时为最盛,工人多至千余。后以洋线输入,仅存数家。”

铁钉行:“……道咸时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每日午后,附近乡民多挑钉到佛,挑炭铁回乡,即俗称‘替钉者’,不绝于道。后以洋铁输入,除装船用榄核钉一种外,余多用洋钉,故制造日少。”

土针行:“亦本乡特产,……咸、同以前最盛,家数约二三十,……后以洋针输入,销路渐减,今仅存数家。”<sup>5</sup>

以上史料,如实描写了因洋铁、洋线、洋钉、洋针等西方铁制品的进入,佛山与铁器制造业有关的行会衰退的景象。佛山最重要的产业——铁器制造业的衰退,更可能把佛山的经济推到了极不景气的状态,其时间大约在光绪年间。不只是铁器制造业,铜制品的进口也使当地铜器制造业出现了衰退。一字铜行曾有20余家制造作坊,但由于洋铜的进口,民国时期只有10余家;铜线行也是佛山的‘特有工业’,但由于洋铜进口也遭排挤,只剩有几家<sup>6</sup>,从事佛山‘特有工艺’打铜行的劳动者从两千余名减少到七、八百名<sup>7</sup>,这不可能与洋铜的输入无关。

西方纺织品的进口也给佛山与衣料有关的行会带来消极影响。布袜行自洋布进口以来,以洋布为原料的布袜制造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但随着各种西方洋袜的进口,穿布袜的人

<sup>1</sup>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佛山资料》,第47-60页。

<sup>2</sup>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佛山资料》,第60-72页)规定了303种产品的工价。

<sup>3</sup> 《陶艺花盘行规》,光绪25年,《佛山资料》,第254页。

<sup>4</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工业》,第10页b,第385页。

<sup>5</sup> 以上所引史料,均出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工业》,第15页b,第387页。

<sup>6</sup> 同上史料,第14页b,第387页。

<sup>7</sup> 同上史料,卷6《实业·工业》,第14页b,第387页。

减少,布袜行的作坊数量由十余家减少到几家。<sup>1</sup>制帽行也遭受了同样的挫折,民国建立以后,由于改革服制,帽子的需要量减少,加之西洋式帽子的输入,购买国产帽子的消费者更少,所以产销量急剧萎缩,故经营制帽业者,由以前的20余家减少到仅剩几家。<sup>2</sup>玩具在正月初一原本销售非常好,但此时也逐渐衰落,同样因为西洋玩具的进口。

行会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西方商品的进口而引起的,但亦有因广东当局的政策和社会风俗的变化而致衰退的情况。铁镬行是佛山特有的工业,曾由官府保障垄断权,向官府供纳军需物资,以故曾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光绪14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中止了向官府交纳物品,解散了行会,因此铁镬行出现了较大的衰退。以前的生产金额可达1年30余万两,而此时则连过去的1/3还不到,因而土炉亦从30余家减少到10余家,锅店也由10余家减少到几家。<sup>3</sup>钮扣行作为制造纽扣的著名工艺行,其产品曾远销牛庄和烟台。但由于人们不再喜欢纽扣而喜用布结,于是制造作坊由20余家减少到几家。<sup>4</sup>门神行也由于人们的信仰和印刷方式的改变,境况不复如前<sup>5</sup>。制作芭蕉扇的葵扇行,也由于服饰变化导致需要量减少,同样出现了衰退。<sup>6</sup>

另一方面,在清末急剧变化时期,也有一些行会反而更加繁盛,例如,机房土布行是随着生丝和绢织物对外出口量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铁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会仍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因为中国的制造技术比西方优秀,所以即使在西方产品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发展。

清初以来,在与东南亚和西方的对外贸易过程中,中国的生丝和绸缎是主要出口商品之一,随着出口量的增加,不只江浙生产的生丝、绸缎大量出口,广东地区的产品也开始出口。但是由于广东所产生丝和绢织物品质量不高,只能在广东省内消费,不能出口到省外或国外,但以江苏生丝为原料的广东绸缎则能够销售到省外或国外。到了光绪末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佛山人购买广东顺德县各乡生产的生丝织造金银缎、八丝缎、充汉府缎、充贡缎等各种绸缎,品质优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产品在广东省内销售不过20%到30%,销售到其他省份的占20%到30%,出口到外国的则占30%-40%,因此机房土布行进一步取得发展,其所属制造作坊中,大机房达20余家,小机房达60-70家,从业者也有2千余名。<sup>7</sup>这是制丝业和绢织业技术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结果。

佛山是铁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技术深厚的地区,部分行会的产品比西方产品还要优秀,因此在竞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生产铁锅的铁镬行作为佛山的‘特有工业’,制作技法上乘,非其他地区可比,同治年间,外国人曾在香港招募劳动者经营此业,但产品质量不如佛山,不得不中止。<sup>8</sup>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两广总督张之洞改变了政策,导致了这一行业的衰退。金箔行的产品质量优秀,不只销售到内地,甚至销售到香港、澳门和外国,如新加坡、新金山、旧金山等地,每年销售额达50-60万元。属于铜箔行的店铺利用佛山所产一字铜制造铜箔,而不用质地松软不合用的洋铜,所产铜箔运也运销到国外。<sup>9</sup>

### 第三章 佛山的商业行会、会馆及其盛衰

<sup>1</sup>同上史料,第11页b,第385页。

<sup>2</sup>同上史料,第10页b,第385页。

<sup>3</sup>同上史料,第15页a,第387页。

<sup>4</sup>同上史料,第14页b-第15页a,第387页。

<sup>5</sup>同上史料,第18页b,第389页。

<sup>6</sup>同上史料,第20页a,第390页。

<sup>7</sup>同上史料,第9页b,第384页。

<sup>8</sup>同上史料,第15页a,第387页。

<sup>9</sup>同上史料,第14页ab,第387页。

## 1. 商业行会

商人为了互相帮助、交换商业信息和联络感情，往往建立专门的行业组织。佛山商人不例外。自明中叶以来，佛山的手工业逐步发展，能够制造中国各地和海外所需的商品，以此为基础，担当商品流通的商人和商人组织也相应发展了起来。我们将清代佛山存在的商业行会按照商品种类、业种等进行分类，列于表 5 之中。<sup>1</sup>

表 5 所列的各种行，经历了雍正 (1723-1735)、乾隆、道光、光绪诸朝，由于时间较长，同一行的名字可能多少有些变更，其中包括 134 种类，差不多囊括了在佛山流通的所有商品和业种之感。一部分行包含在手工业行会中，因为手工业的行同时具有销售自己制造的商品的职能，发挥商业的行的作用。例如，铸发行作为铸造铁器的手工业店铺组织，既有手工业行会(会馆：既济堂)，又有作为销售产品的商人组织，组织了商业行会(会馆：江济堂)<sup>2</sup>。新衣行具有制衣手工业行会<sup>3</sup>的性质，同时又是销售衣服的商业行会<sup>4</sup>。

与广东省会广州相比，佛山是一个商业更加繁荣的城市，<sup>5</sup> 因此商业行会多种多样，更兼佛山位于水路交通要地，将从外国进口到广州的商品运送、销售到中国各地，必须经过佛山；搬运到广州、尔后出口外国的中国内地商品也必须经过佛山，因此经佛山流通的商品特别多，因而当地拥有大量的商人组织即商业行会，从事进口商品的西货行和洋货行，从事进口棉花、棉纱的花纱行<sup>6</sup>，从事出口商品(绢织物、茶、南京布、陶瓷器、雪糖、金箔等)的绸缎棉花行、茶纸行、京布行、磁器行、白糖行、金箔行等，就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商业行会。

表 5：清代佛山按照交易商品种类、业种区分的行会

交易商品、业种	行会名称
铁器制品	生铁行、铁锅刚济堂、铁器行、铸发行、新钉行
金属制品	金箔宝光堂、金丝行、铜线行、铜叶行、铜行、铜器行、锡箔元兴祖会、锡薄行、锡行
绢织物、棉织物	绸缎棉花行、布行、京布行、花纱行、兴宁布帮
衣服、衣服附着物	成衣行、丽袞金银钮行、凿花钮行、花钮行
帽子、洋袜、鞋	秋帽祖会、秋帽行、冬帽祖会、绵袜行、履行
衣料原料	麻行、麻行栈房、青麻行、绸缎棉花行、苧麻行
染色与染料	朱砂年红行、靛行、青靛行、至宝生色行、至宝联兴生色行、知色堂、彩生联行、南洋染料行、土靛木膏行
谷食和菜蔬	米行、豆行、七市糙米行、村尾新菜市
加工食品	糖行、白糖行、百岁社饼行、酒饼行、油行、油豆行、面行
家畜	金猪行、四沙宰猪行、猪栏行
水果与干果	京果行、果干行、槟榔行、枝圆行
海产物	鲜鱼行、海味行、食盐行
嗜好品、娱乐用品	敬业酒行、烟叶行、烟行、酒饼行、酒行敬业堂、茶纸行、菸叶行、

<sup>1</sup> 《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清涌碑记》（见《佛山资料》，第 100-101 页，第 156-201 页，第 210-248 页）；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 2，《初与邱滋畚书》，第 10 页a；《佛山街里》，道光 10 年，怡文堂(谭棣华，同上书，第 226-233 页)；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1 页a-第 27 页b，第 390-393 页。

<sup>2</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6 页a，第 393 页。

<sup>3</sup> 同上史料，卷 6《实业·工业》，第 11 页a，第 385 页。

<sup>4</sup> 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b，第 392 页。

<sup>5</sup>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复印报刊资料编辑部，复印报刊资料 F7《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88 年 第 2 期)，另参朴基水：《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之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第 69 辑，2000，第 138-141 页。

<sup>6</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a 第 392 页。

	福建条丝行、爆竹行
陶瓷器	磁器行、缸瓦行
建筑资材	泥水荣盛堂、履昌石行、石行永庆堂、砖窑合德堂
木材及竹子	木帮安顺堂、木行、集木行、青竹行、香竹行
肥料	粪草行、田料行
纸张类	揽磨纸行、福建纸行、莲峰纸行、黄白纸行、抄纸首成行、南北纸行
药材	叁药行、参茸行、药材行
燃料、火石	格柴行、大炭行、美薪柴行、柴排行、柴行、柴栏行、五桂柴行、聚庆炭行、炭行、火水行、火石行
进口商品	西货行、花梨西货怡思堂、洋货行
宗教、葬礼用品	元宝行合盛堂、神香行
贵金属、宝石	银器行、至宝玉成行、至宝祖社、玉器行
商品包装	板箱同善堂、板箱（木界）斗行、板箱行
商品流通、交通业	浮货行、五斗总埠、平码行、渡船行、挑夫行
金融业、住宿业	按押行、钱行、旅馆行、歇客行
劳动力供给、服务业	包头行、包办行、翦发行
其他商品	鼓乐乐兴堂、硝务公慎堂、锋货行、南北杂货行、香粉香竹行

不仅对外贸易,而且与国内各地的商品流通,都推动了佛山商业的发展;不只是广东省内产品,而且由国内其他省流入的商品都比较多,向其他地区流出的商品也不少。经营从事这些商品交易的行会大量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广东嘉应州兴宁县生产、流入佛山的棉布,由兴宁布帮进行交易,罗定生产、流入佛山的香粉<sup>1</sup>由香粉香竹行担当交易;由广西、四川、山西、陕西等地进入佛山的药材由药材行进行交易,从吉林、宁古塔等地进入的人参和鹿茸由参茸行进行交易。<sup>2</sup>

除了流通一般商品的商人组织行会外,还有一些在商品流通中发挥辅助作用的行会,即与包装业、金融业、住宿业、交通业有关的行会,此点为佛山商业行会的特征。表5中所见的板箱同善堂、板箱(木界)斗行、板箱行是从事商品包装的行会,按押行、钱行是向商人和手工业者提供金融上的便利的行会,旅馆行、歇客行是和住宿业有关的行会,五斗总埠、平码行、渡船行、挑夫行则是与交通运输有关的行会。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的重复设置,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商业行会的存在,与中国国内各地的商品流通有关和在商品流通中发挥辅助作用的几个业种的存在等,使佛山商业行会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手工业行会。

## 2. 商业会馆和地缘性会馆

商业行会中具有自己的会馆或堂的情况有多少呢?商人们的会馆和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交易商品或者按照业种组织行会的会馆或堂,另一种是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商人设立的会馆。表6把清代佛山从事相同业种、相同商品买卖的商人的会馆和堂图表化,表7则是根据商人出生地来列表。<sup>3</sup>

<sup>1</sup>佚名:《南海乡土志》,光绪34年抄本,卷14“物产”,第6页a。

<sup>2</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商业》,第24页a,第392页。

<sup>3</sup>表6和表7系利用以下资料制成:《参药行碑记》,乾隆32年;《乾隆年间佛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重修山陕会馆捐签碑》,道光元年;《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道光三十年;《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清涌碑记》;《重修轩辕会馆碑记》,光绪24年(《佛山资料》,第79-80页,第100-101页,第126-127页,第144-153页,第156-201页,第210-248页,第253-54页。);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初与邱滋斋书》,第10页a;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会馆》,第36页b-第37页a,第71页;《佛山街里》,道光10年,怡文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工业》,第9页b-第20页b,第384-390

表 6 显示：共有 25 个相同业种的商业(包含服务业)行会拥有会馆或堂，<sup>1</sup>其中药材行会有 4 个，织物及衣服行会有 4 个，服务业类行会有 4 个，染料及颜料行会有 3 个，铁制品行会有 2 个，水果及食品行会有 2 个，纸、木材、进口物品、装饰品、典当铺、商品批发业等行会各 1 个。据此可知，与手工业行会相比，在商业领域中，有较多业种的行会设置了会馆或堂，可能是由于原来商业行会的种类比较多；但是比起手工业行会中有 33 个拥有着会馆或堂来，数量上相对要少一些，这一点仍体现了佛山作为手工业城市的特征。

比起手工业来，从事商业的店铺劳动者或店员的数字一般较少，因此劳动者的组织即西家行不多见，只有在杉行里才出现了东家的会馆(集庆堂会馆)和西友的堂(乐成堂)，由此可以看出：商业行会的会馆或堂主要是商店主人们为了保持亲睦关系、交换情报和互相扶助而建立的组织。

商业行会会馆和堂的设立时间与手工业行会类似，最早的是在雍正 11 年(1733)设立的福建纸行的莲峰会馆；后来，乾隆年间设立了 2 个会馆(参药行和铸发行)，嘉庆年间设立 1 个会馆(新钉行)，其余大抵均在道光年间以后设立。和手工业行会情况一样，表中未注明设立年代的行会，被推定为设立于光绪年间，其会馆和堂的设立时间被推定为道光到光绪年间。根据有关情况可以看出，佛山商业行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成长业绩，亦非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而是清代后期的道光到光绪时期。

考察行会的规模，既有 104-105 个商店参与的京布行，也有不过数家商店的西土药材行，差距甚大。药材业也被认为是佛山的一个重要业种，有 4 个会馆或堂，其所属的店铺数量也比较多，药材行达 50 余家，熟药行达 40 余家，参药行达 27 家，西土药材行亦有数家。药材业所属的店铺数量也较多，单个店铺的经济力量一般也似乎较强。乾隆 32 年(1767)建参药行会馆，收到了行会所属店铺的捐款：保济堂捐银 213 两 2 钱，茂生堂捐银 201 两，在所有 27 个店铺中，捐银 100 两以上的店铺达 17 个。<sup>2</sup>由此可知参药行中各药材商店的规模比较大，经济力量也比较强。担当杉木等木材销售的杉行也属较大的行会，其所属的店铺数量达 50-60 家。佛山的织物生产和销售兴旺，绸缎行也是规模比较大的行会，其所属店铺大约有 50 余家。

**表 6：清代佛山的商业行会及会馆、堂**

行会名	会馆、堂名	会馆设立年	店铺数	其他
福建纸行	莲峰会馆	雍正 11 年		福建长汀、连城两县众纸商建
参药行	参药行会馆	乾隆 32 年	27 个所	豆豉巷有二十余肆
铸发行	江济堂会馆	乾隆 44 年		兼手工业行会
新钉行	金玉堂会馆	嘉庆年间	十余家	
药材行	药材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五十余家	分生药、熟药两行
熟药行	寿世祖安堂		四十余家	
杉行	集庆堂会馆 (东家)	道光 10 年以前	五六十余家	
	乐成堂(西家)			
槟榔行	筛择槟榔行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十余家	故亦称筛择行
西货行	西货行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金丝行	金丝行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戏行	琼花会馆	道光 10 年以前		

页。

<sup>1</sup>其中的福建纸行和潮蓝行(广东潮州府)是从事相同职业种类、并出生于同一地方的商人所组织的行会。

<sup>2</sup>《参药行碑记》，乾隆 32 年(《佛山资料》，第 79-80 页)。

潮蓝行	潮蓝行会馆	道光 10 年		
当行	当行会馆	道光 10 年		
道巫行	道巫行会馆	道光 17 年		
鼓乐行	鼓乐行会馆	咸丰 9 年		
肩輿行	肩輿行会馆	光绪 7 年		
京布行	乐和会馆	光绪 16 年重修	百四五家	
平码行	光裕堂		数家	代行商品销售
西土药材行	靖安堂		数家	北胜街等处
油豆行	油豆行会馆		十余家	祀关帝
绸缎行	阐义会馆		大小五十余家	零翦店多在公正市, 发行店多在富文里、北胜街等处
新衣行	福胜堂		二十余家	手工业行会 新衣行存在
纱纸颜料行	源顺堂会馆		约数家	
苧麻行	昭远堂			大者:麻行, 小者:麻店
靛行	同福堂		十余家	

以上考察了按业种区分的商业行会及其会馆, 同中国其他城镇一样, 在佛山, 出生于相同地区的商人也组成了会馆, 表 7 对佛山具有地缘性质的会馆进行了整理。

佛山的地缘性会馆, 大体可分为两种, 即广东商人的会馆和外省商人的会馆, 对于流源会馆、源流会馆, 由于除名称以外没有其他记录, 不能详细了解, 但从名称上看, 可能是佛山土著商人的会馆, 可能是随着时期不同而改变了名称和地点, 也可能由于佛山商人之间的意见不同, 在不同场所、用不同名称新建了会馆。潮蓝行会馆应为交易染料——蓝的潮州商人组织。佛山在行政上隶属于南海县, 南海县又被称为南邑,<sup>1</sup>所以南邑道祖庙似乎是包括佛山在内的南海县商人的组织。明清时期, 位于佛山镇祖庙铺的祖庙是佛山居民的信仰中心, 佛山或南海县商人在祖庙集会可能是非常平常的。琼花会馆是粤剧艺人集中组班和排练的基地, 据说明代万历年间粤剧戏班建立了行会<sup>2</sup>。怀阳会馆推测应为广西梧州府怀集县和广东连州直隶州阳山县商人的会馆, 怀集县不只与广东阳山县相邻, 还向广东边突出, 所以与广东的往来历来就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 年)归划为广东省。<sup>3</sup>佛山的广东商人会馆, 或以府为单位成立, 或者以县为单位成立, 也就是说, 它们是以更加细分的地区为单位而建立的。

表 7: 清代佛山具有地缘性质的会馆

行会名	会馆	会馆设立年	店铺数	其他
	流源会馆	乾隆年间		
潮蓝行	潮蓝行会馆	道光 10 年		潮州府
	源流会馆	道光 10 年		
	南邑道祖庙	道光 11 年以前		
戏行	琼花会馆	道光 11 年以前		
	怀阳会馆	1876 年以前		怀集、阳山
福建纸行	莲峰会馆	雍正 11 年		福建长汀、连城 两县众纸商建

<sup>1</sup> 《申报》光绪 7 年 8 月 30 日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第 702 页。)中把南海县知县徐某称为南邑尊徐明府。

<sup>2</sup> 戏班行会忌火灾, 故祀火神“华光”为祖师之一, 神话传说玉帝曾赐华光以“琼花之宴”, 会馆得名本此。《广东省佛山市地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第 362 页。

<sup>3</sup> 《广东省地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9, 第 213 页。

	山陕会馆	乾隆 45 年	191 家	山西、陕西
	楚北会馆	道光 10 年		湖北
	江西会馆	道光 10 年		
	山陕福地会馆	道光 10 年	209 家	山西、陕西
	楚南会馆	道光 11 年以前		湖南

外省商人的会馆如表 7 所见,是由福建、湖南、湖北、山西、陕西、江西等省商人建立的,其中由山西和陕西省商人建立的会馆,有乾隆 45 年(1780)建立的山陕会馆和道光 10 年建立的山陕福地会馆两处,分别有 191 家、209 家参与。特别是后者,为了重修会馆,募集了 4,567 两余资金。从商人的数字和募集的金额数来看,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势力绝对不弱。但是山西或陕西商人都不是在佛山活动的外省商人的代表势力,虽然无法正确估计其他省的商人的规模和势力,但是有可进行间接推定的资料。1876 年重修天后元君古庙而募集资金,捐献的商人和团体的名单中,在商号前面并列记着外省名称的例子有 49 件,其中福建有 21 件,江西有 8 件,湖南有 6 件,江苏有 4 件,广西有 3 件,云南有 3 件,浙江、河南、陕甘、湖北各有 1 件。<sup>1</sup>陕西商人只有 1 名,山西商人则没有。从资料来看,外省的捐献商人中,福建商人最多。如表 7 所见,福建商人建立了莲峰会馆(福建纸行),此外还组织了交易条丝烟的福建条丝行,<sup>2</sup>20 家福建商人在汾水、福宁街集中开设店铺。<sup>3</sup>通过这些情况,可以推定活动于佛山的外省商人中,福建商人最多。江西商人也不少,同治 12 年(1873)的《禅镇江西义庄官示抄刻碑记》<sup>4</sup>中记载“职乡江西一省,客粤谋生者,人数殷繁。其间腰缠万贯、衣锦荣归者固不乏人。”在佛山从事贸易的江西商人中,有的不幸客死在佛山,江西人为他们建立了用于假埋葬尸体的葬地——义庄和义冢。<sup>5</sup>

地缘性会馆的建立年代,大致在道光年间或道光以前。比按业种区分的会馆更早一些。由此可知,在商业和商人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在交易商品专门化、专业化出现以前,首先由同乡商人建立组织;随着商品流通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商人按照交易商品、业种建立了行会和会馆,此一过程可以说是商业发展的结果。

### 3、商业行会的盛衰与商人的社会地位

随着清末社会经济的变化,佛山的商业行会也经历了兴亡盛衰的变迁过程。与手工业行会一样,既有衰退的行会,也有发展的行会。行会的衰退的原因有多种,但首先一点是由于西方商品的进口,使当时商人受到了打击。福建纸行把福建汀州山场生产的纸张运搬到佛山,转销各地,由于洋纸的进口,销路渐渐萎缩,商店不过只有 8 家。<sup>6</sup>销售铁钉的新钉行店铺在光绪年间有十余家,后来减少到 6 家,<sup>7</sup>可能因洋钉的进口使佛山所产铁钉的需要量减少。除上述由于西方商品进口使中国产品的需要量减少,相应商品的行会呈现衰退的事例之外,由于洋面的进口,土面的销售减少,面行亦因之衰退;<sup>8</sup>由于西方染料流行,土靛木膏行也萎缩了。<sup>9</sup>虽然史料记载没有指出由于西方染料进口而使土靛销售减少,但却记载当地交易西方染料的南洋染料行达到了 10 余家<sup>10</sup>,由此可以推知:土靛的衰退可能起因于西方染料的进口。

<sup>1</sup> 《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资料》，第 156-201 页。

<sup>2</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6 页 a，第 393 页。

<sup>3</sup> 《光绪二年天后元君古庙碑记》，《佛山资料》，第 166-167 页。

<sup>4</sup> 《佛山资料》，第 154-155 页。

<sup>5</sup> 《禅镇江西义庄官示抄刻碑记》，《佛山资料》，第 154-155 页。

<sup>6</sup>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商业》，第 25 页 b，第 392 页。

<sup>7</sup> 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2 页 a，第 391 页。

<sup>8</sup> 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3 页 b，第 391 页。

<sup>9</sup> 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6 页 b，第 393 页记载：“土靛木膏行：土靛前有四五家，今无存。”

<sup>10</sup> 同前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5 页 a，第 392 页。

还有从事火石交易的火石行，由于火柴的出现<sup>1</sup>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槟榔行由于厘金负担太重，店铺搬到了香港，所以也呈现了衰退现象。<sup>2</sup>南北纸行原来都通过水运首先把纸张搬运到佛山、再转销各地，所以佛山的纸行曾呈现出繁荣景象，但随着新的交通手段——铁路的出现，店铺都搬到了便于利用铁路的广州，所以佛山的纸行店铺数量剧减。<sup>3</sup>光绪年间，苧麻行的商人曾获利甚丰，但由于进口的麻集中于广州，佛山苧麻行业的营销状况日渐不如从前景气。<sup>4</sup>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商品的进口导致佛山商业行会发生严重危机，但也有一些行会继续维持着。经营传统染料的商人组织——靛行，在洋靛持续不断进口的状况下，因土靛的品质比洋靛优秀，故能幸免衰退<sup>5</sup>。清末从西方进口的代表性商品——洋布泛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推想广东地区也是同样的状况，但出人意料的是，佛山的京布行面对洋布似乎还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京布行主要从事南京、苏州、松江产的棉布交易，也从事江西布和广东兴宁、佛山近郊等地的土布贸易，迄止 20 世纪 20 年代，仍没有呈现衰退的征兆，有关店铺保持在 104-105 个<sup>6</sup>，即反映了这一事实。经营广东所产雪糖的白糖行，在洋糖进口的状况下，亦仍未出现衰退的迹象。<sup>7</sup>

部分行会面对西方商品大量流入的状况，通过变革继续维持了行会自身的繁荣。原来主要经营绢织物的绸缎行，也经营从西方进口的‘绒毯毡羽之属’，从而既经营国产的织物，又经营进口织物，因此到清末仍有 50 余家从事有关经营活动。<sup>8</sup>南洋染料行同时经营从外国进口的染料和云南产的染料，因而得以继续维持下去。<sup>9</sup>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业种的行会，由于西方商品的进口反而得到了发展，它们当然是经营西方商品的行会。经营石油的火水行，自同治末年以來，随着石油进口，并且使用者日益增多，经营石油的商店也增多，行会也随之发展。<sup>10</sup>此种情况，在经营洋纸的洋纸行、经营进口棉花或棉纱的花纱行、经营西方杂货的洋货行，都可看到<sup>11</sup>

商业发展和商人势力的扩大，必然导致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在清代的佛山，“弃儒而商”的风潮不断扩散，<sup>12</sup>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佛山人的心目中，通过商业理财比通过科举立身扬名更容易、更有利。例如佛山盐商梁玉成的家境较好，但还是抛弃了儒业，转而从事商业。<sup>13</sup>通过商业积蓄钱财以教育家子弟，通过谋作绅士或官吏来立身扬名，是中国的普通现象，佛山也不例外。清代佛山吴氏靠贩盐起家成为富豪，乾隆年间，盐总商吴济运认真教育儿子吴荣光，嘉庆 4 年 (1799) 吴荣光考中进士，至道光年间升迁为湖南巡抚，吴氏于是成为清代佛山最有名望的家族。<sup>14</sup>梁玉成放弃科举成为盐商，数年后积累了巨万家财，此后他把财产分给两个弟弟，使弟弟梁藹如专心学业，梁藹如如科举考试成功，成为进士。<sup>15</sup>另一方面，成为官吏或者退职以后，通过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积蓄财富也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嘉庆年间，曾任山东盐运司的李可琼退职后回到佛山，经营高利贷，向佛山的“晋丰”、广州的“安盛”等银

<sup>1</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工业》，第 19 页 b，第 389 页。

<sup>2</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a，第 392 页。

<sup>3</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5 页 b，第 392 页。

<sup>4</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2 页 b，第 391 页。

<sup>5</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b，第 392 页。

<sup>6</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b，第 392 页。

<sup>7</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3 页 b，第 391 页。

<sup>8</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b，第 392 页。

<sup>9</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5 页 a，第 392 页。

<sup>10</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5 页 b，第 392 页。

<sup>11</sup>同上史料，卷 6《实业·商业》，第 24 页 a，第 25 页 b，第 26 页 a，第 392-3 页。

<sup>12</sup>蒋祖缘：《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历史学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 页。

<sup>13</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4《人物六·义行》，第 27 页 ab，第 590 页。

<sup>14</sup>参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 314-317 页。

<sup>15</sup>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4《人物六·义行》，第 27 页 ab，第 590 页。

铺投放了大量资金。<sup>1</sup>佛山的参药店本来就是资本非常雄厚的药材店,道光 20 年(1840),《重修参葯会馆碑记》中记载的 6 名发起者中,有 3 名是南海县的主簿,他们分别是福裕堂、大德堂、万春堂等 3 家参药店的店主。<sup>2</sup>笔者认为:这些现象是使人们对商人的认识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书生放弃科举走商人之路的风潮不断蔓延时,社会上就可能不再认为商业之路是卑贱职业,一些官吏和绅士的亲属经商、现任或退職官吏参与商业等,都会促使人们转变观念。

在清末佛山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阶层是官僚或绅士,佛山的公共事务是由前任官僚或绅士组成的大魁堂处理、决定的。大魁堂原来是崇正社学的一个建筑物的名称,后来成为佛山绅士们的集会地点,是计划、处理佛山重要事务(例如义仓建设和运营、佛山涌的浚濬事业——清涌等)的机构,担当大魁堂实际业务的值事,由绅士们公选,选拔基准不是功名的高低,而是对业务的忠实程度和能力,<sup>3</sup>嘉庆以后,以商人担任大魁堂值事的情况渐渐多了起来。在嘉庆 17 年(1812),在大魁堂的主导下作了一个规定,即从佛山 24 铺中推举 3 名义仓值事,其中 1 名必需由殷实的行店担任。<sup>4</sup>光绪 9 年(1883),在佛山进行河涌的浚濬,在清涌的同时选定了清涌值事,其中除 26 名绅士外,足有 430 个行店、5 个商人团体、33 个冶铁炉(店铺)。<sup>5</sup>行店拿商号标记,可能不是商店名,就是手工业店铺的名称,据此可知,从事工商业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大量被选为值事,这是清末佛山商人和手工业主的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

随着商人和手工业主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当时人们的认识也起了一定变化,并体现在家族的家训上,从宣统 2 年(1910)刊行的家训《岭南冼氏宗谱》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称:

力本业:天下之民各有本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货财。此四者,皆人生之本业,苟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sup>6</sup>

这种典型的“四民皆本论”,清楚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佛山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上升,社会对工商业的认识相应发生了变化。

## 结论

自明中叶以来,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作为手工业城市的佛山镇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以水路交通便利为基础,作为国内各省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中转地,成为凌驾于广东省会——广州之上的商业城市。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首先,佛山既是手工业城市,同时又是商业城市。正是由于这一特征,佛山的户均人口数量高于中国一般的户均人口数(5 人),达到了 5.9 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人口统计里包括了手工业店铺和商店中雇佣的工人、店员的结果;第二,城市区域和设施中,街道、码头和桥梁的数字迅速增加,这是商品和原料流通发达的结果,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第三,城市的空间构造特征是佛山南部、东南部为手工业区,北部为商业区。

引导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组织行会和会馆大量出现,呈现了几个特征:首先,手工业部门的情况是:佛山不愧是铁器制造业兴盛的城市,90 个手工业行会中,与铁器手工业有关的行会达到 32 个;33 个手工业会馆中,与铁器手工业

<sup>1</sup>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广东社会科学》1985 年 3 期,兹据人大复印资料 F7《经济史》1986 年 2 期,第 95 页。

<sup>2</sup>参蒋祖缘:《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第 18 页。

<sup>3</sup>参上揭罗一星著,第 362-370 页。

<sup>4</sup>《佛镇义仓总录》卷 1,第 38 页。

<sup>5</sup>《佛山清涌碑记》,光绪 9 年。《佛山资料》,第 202-208 页。

<sup>6</sup>冼宝翰总纂:《岭南冼氏宗谱》,宣统 2 年(1910)刻本,卷五之一《艺文谱上》,《家训》1 卷,湖州知府冼国干撰,第 18 页 b,第 19 页 a。

有关的达到 9 个。通过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铁器制造业是佛山手工业的主要产业。手工业行会中出现了手工业主的组织——东家行和劳动者的组织——西家行，特别是西家行反映了佛山手工业劳动者的数量规模和组织化程度。西家行，并非与东家行对立、纷争的结果，而是协助东家行；东家行也把西家行看作是协商的对象。在这一方面，佛山与苏州业主和劳动者纷争、对立激烈的情况完全不同；其次，从行会数量来说，商业行会(134 个)远远超过手工业行会，这是因为在佛山流通的商品，种类多样，存在着补助商品流通的几个领域。虽然存在着此种多样性，但会馆的数字(25 个)还是没达到手工业会馆的水平，可能因为行会虽然多种多样，但各行会的规模比手工业行会要弱小一些。

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几乎看不见其他地方常见的称为“公所”的组织名称；第二，佛山的行会组织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建立的，而会馆则主要是在各行会充分成长、发展的清代后期(道光~光绪年间)建立的，这一点与佛山城市的发展速度在鸦片战争以后更加快速的事实相符合；第三，随着清末的社会变化，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出现了兴亡盛衰的反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铁制品、金属制品和棉织品等的流入，相应的手工业、商业行会出现了衰退，在铁器制造业和铁器销售业方面，其影响明显；由于风俗变迁、政策变化和交通手段变化等原因而呈现停滞的行会也不少。但也不是所有行会都因上述原因而无力地倒下，一部分行业的行会以深厚的技术积累为基础，与西方产品展开竞争，某些行会(如机房土布行)反而随着出口扩大，越到清末越获得了发展；一部分行会则通过同时交易西方产品得以生存下去，而交易进口产品的部分行会则随着进口增加而扩大了组织。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达，佛山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这也是佛山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当时佛山出现了抛弃科举而从事商业的现象，靠商业致富的人家，为了把子弟培养为绅士和官僚而努力，清末佛山的很多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参与了公共事业。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一般人都改变了对工商业者的认识，在清末部分宗族的家训中出现了肯定工商业、鼓励从事工商业的内容，可以视为“四民皆本论”扩散的一个重要表现。

## Urban Development and Guilds in 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in Foshan Town in the Qing Dynasty

Keesoo Park

**Abstract:** Foshan Town was flourishing as an industrial 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because of ironware handicraft. Thanks to its immensely facilitated land and water communication, Foshan distinguished itself as a center for inter-provinci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s, even surpassing Guangzhou, the ca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inspects guilds and firms of handicraftsmen and merchants in Foshan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argues that leading 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helped to bring about urba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many guilds and firms that shared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 there was hardly an institution called “*Gongsuo* (company)” as often seen in other places; B), guilds emerged in Foshan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and firms were mainly established in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 Daoguan and the Emperor Guangx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various guilds were fully developed; C), guilds of 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went ups and downs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pium War, man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uilds declined due to pouring Western ironware, other hardware and cotton goods, but some guilds competed with Western products technologically and some commercial guilds even got developed with increasing expor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e of the social changes in Foshan was that social status of handicraftsmen and merchants went up gradually becaus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sperity.

**Keywords:** Foshan Town; Urban Development; Handicraft Guild; Handicraft Firm; Commercial Guild; Commercial Firm

**收稿日期:** 2005-05-30

**作者简介:** 朴基水, 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教授。